

历史·田野丛书



白垓乡的故事

地域史脉络下的乡村
社会建构

肖文评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历史·田野
丛书

白垩乡的故事

地域史脉络下的乡村
社会建构

肖文评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1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垩乡的故事：地域史脉络下的乡村社会建构 /
肖文评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7
(历史·田野丛书)
ISBN 978-7-108-03677-3

I. ①白… II. ①肖… III. ①乡村—社会变迁—
研究—潮州市 IV. ①C91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33731号

责任编辑 徐国强

封扉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年7月北京第1版
2011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张32.5

字 数 465千字

印 数 0,001—4,000册

定 价 56.00元

肖文评，1967年6月出生，江西泰和人。江西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中山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广东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研究员，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任广东省普通高
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副院长。主要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重点研究粤东客家地区的历史、社会与文化。

主编：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
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

本成果的调查、研究和出版得到以下项目经费的资助：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研究项目经费、

香港特别行政区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卓越学科领域计划（第五轮）：

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广东省教育厅重大项目“粤东乡土建筑与客家文化生态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以围龙屋为重点”（编号：08JDTDXM77001）、

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科学省市共建重点研究基地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研究经费、

广东嘉应学院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粤东客家乡村社会变迁史研究

——以大埔县百侯村为中心”（编号：06SKZ03），

本成果是以上项目的部分研究成果。

走向历史现场

陈春声

1939年，从日本学习社会学归国不久的傅衣凌，在距福建永安县城十多里黄历乡的一间老屋，无意中发现了一大箱民间契约文书，自明代嘉靖年间至民国有数百张之多。他仔细研读了这些契约，在此基础上，写出了在学术史上影响深远的《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在该书中，傅先生强调民间文书的收集和整理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价值，指出在进行“农村的经济小区的研究”时，应“不放弃其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形态之总的轮廓的说明”，反对“以偏概全”，表达了建立中国社会经济史“总的体系”的追求，颇具概括性地呈现了他一直坚持的关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方法的基本理念。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上，傅先生一直强调“把活材料与死文字两者结合起来”的研究方法，包括了社会经济史研究者要在心智上和情感上回到历史现场的深刻意涵。正是这种把文献分析与实地调查相结合，“接触社会，认识社会”，“以民俗乡例证史，以实物碑刻证史，以民间文献证史”，努力回到历史现场的研究方法，使傅衣凌先生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重要的奠基者之一。

也是在1939年，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另一位重要的奠基者梁方仲教授，正在陕甘宁三省进行为期八个月的农村调查。梁先生受过严

白垩乡的故事：地域史脉络下的乡村社会建构

格的经济学和社会学训练，以研究明代赋役制度著名。他对历史上经济问题的关注，植根于对现代中国农村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怀之中。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他重视社会调查，曾多次深入农村调查土地关系和农民田赋负担问题。他是“利用地方志资料来研究王朝制度与地方社会的学者中最为成功的一位”，也特别重视民间文献在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价值。梁方仲先生致力于各种公私档案的收集和解读，力图在整理、辨析、解读官方数字的基础上，结合对纳户粮米执照与土地契约等票据文书的考释，为后人提供逐步深入揭示社会经济事实的一条路径。

事实上，在中国近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奠基时期，在与傅衣凌、梁方仲先生同时代的一批眼界开阔、学识宏博的学者身上，基本上看不到画地为牢的学科偏见。对他们来说，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是一个自然的思想过程。以梁方仲先生长期任教的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为例，傅斯年等先生 20 世纪 20 年代在这里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就倡导历史学、语言学与民俗学、人类学相结合的研究风格，并在研究所中设立人类学组，培养研究生，开展民族学与民俗学的调查研究；顾颉刚、容肇祖、钟敬文等先生开展具有奠基意义的民俗学研究，对民间宗教、民间文献和仪式行为给予高度关注，他们所开展的乡村社会调查，表现了历史学和人类学相结合的研究特色；杨成志、江应梁等先生，以及当时任教于岭南大学的陈序经先生等，还在彝族、傣族、瑶族、水上居民和其他南方不同族群及区域的研究方面，做了许多具有奠基意义的努力。在这些研究中，文献分析与田野调查的结合，表现得和谐而富于创意，并未见后来一些研究者人为制造的那种紧张。

在这里回顾这些令人难以忘怀的往事，是为了表达一个期望，即希望这套丛书的编辑和出版，能够成为一个有着深远渊源和深厚积累的学术追求的一部分。丛书所反映的研究取向，应该说是学有所本的。丛书的编者和作者们，从许多前辈学者的具体的研究作品中，获益良深。他们也因此相信，在现阶段要表达一种有方向感的学术追求，最好的方法不是编撰条理系统的教科书，而是要提交具体的有深度的研究作品，供同行们批评。

他们相信，在现阶段，各种试图从新的角度解释中国传统社会历史的努力，都不应该过分追求具有宏大叙事风格的表面上的系统化，而是要尽量通过区域的、个案的、具体事件的研究表达出对历史整体的理解。他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要达成这样的目的，从一开始就要追求打破画地为牢的学科分类，采取多学科整合的研究取向。应努力把传统中国社会研究中社会历史学和文化人类学等不同的学术风格结合起来，通过实证的、具体的研究，努力把田野调查和文献分析、历时性研究与结构性分析、国家制度研究与基层社会研究真正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情感、心智和理性上都尽量回到历史现场去。在具体的研究中，既要把个案的、区域的研究置于对整体历史的关怀之中，努力注意从中国历史的实际和中国人的意识出发理解传统中国社会历史现象，从不同地区移民、拓殖、身份与族群关系等方面重新审视传统中国社会的国家认同，又从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国家制度和国家观念出发理解具体地域中“地方性知识”与“区域文化”被创造与传播的机制。

这套丛书最容易引人注目的特点之一，是大量的地方文献、民间文书和口述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利用。这样的工作，不仅具有在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历史背景之下“抢救”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具有学术积累的意义；更重要的是，丛书的编者相信，在此基础上，建立并发展起有自己特色的民间与地方文献的解读方法和分析工具，是将中国社会史研究建立于更坚实的学术基础之上的关键环节之一。正如收入这套丛书的许多著作所反映出来的，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已经发展出一套较为系统的解读乡村社会中各种资料的有效方法，包括族谱、契约、碑刻、宗教科仪书、账本、书信和传说等，这种或许可被称为“民间历史文献学”的独具特色的学问和方法，是传统的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或汉学家都没有完全掌握和理解的。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这套丛书的编者一直保持其学术自信心和创造力的最重要基础之一。

这套丛书追求通过区域的、个案的、具体事件的研究表达出对历史整体理解的学术风格，结果，就有必要就“区域研究”的问题多

白墩乡的故事：地域史脉络下的乡村社会建构——

谈几句。特别是要就这样的取向，表达某种反省和自我批判的态度。

近年有关中国传统社会区域研究的论著越来越多，许多年轻的研究者在步入学术之门时所提交的学位论文，常常是有关区域研究的作品。曾经困扰过上一辈学者的区域研究是否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区域的“微观”研究是否与“宏观”的通史叙述具有同等价值之类带有历史哲学色彩的问题，基本上不再是影响区域社会研究的思想顾虑。

窃以为，深化传统中国社会经济区域研究的关键之一，在于新一代的研究者要有把握区域社会发展内在脉络的自觉的学术追求。毋庸讳言，时下所见大量的区域研究作品中，具有严格学术史意义的思想创造的还是凤毛麟角，许多研究成果在学术上的贡献，仍主要限于地方性资料的发现与整理，以及在此基础上对某些过去较少为人注意的“地方性知识”的描述。更多的著作，实际上只是几十年来常见的《中国通史》教科书的地方性版本，有一些心怀大志、勤奋刻苦的学者，穷一二十年工夫，最后发现他所做的只不过是一场既有思考和写作框架下的文字填空游戏。传统社会区域研究中，学术创造和思想发明明显薄弱，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学术从业者追寻历史内在脉络的学术自觉的严重缺失。这套丛书在选录著作的时候，力求尽量避免这样的缺失，但编者不得不坦言的是，要达到理想的状态，仍需要很长的过程。

眼下的区域研究论著，除了有一些作品仍旧套用常见的通史教科书写作模式外，还有许多作者热衷于对所谓区域社会历史的“特性”做一些简洁而便于记忆的归纳。这种做法似是而非，偶尔可见作者的聪明，但却谈不上思想创造之贡献，常常是把水越搅越浑。对所谓“地方特性”的归纳，一般难免陷于学术上的“假问题”之中。用便于记忆但差不多可到处适用的若干文字符号来表述一个地区的所谓特点，再根据这种不需下苦功夫就能构想出来的分类方式，将丰富的区域历史文献剪裁成支离破碎的片段粘贴上去，这样的做法再泛滥下去，将会使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整体水平继续与国际学术界保持着相当遥远的距离。要理解特定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有贡献的做法不

是去归纳“特点”，而应该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揭示社会、经济和人的活动的“机制”上面。我们多明白一些在历史上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之下，人们从事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最基本的行事方式，特别是要办成事时应该遵循的最基本的规矩，我们对这个社会的内在的运行机制，就会多一分“理解之同情”。当然，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回到历史现场”的追求，就不是可有可无的了。

在传统中国的区域社会研究中，“国家”的存在是研究者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之一。在提倡“区域研究”的时候，不少研究者们不假思索地运用“国家—地方”、“全国—区域”、“精英—民众”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观念作为分析历史的工具，并实际上赋予了“区域”、“地方”、“民众”某种具有宗教意味的“正统性”意义。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保存有数千年历史文献，关于历代王朝的典章制度记载相当完备，国家的权力和使用文字的传统深入民间社会，具有极大差异的“地方社会”长期拥有共同的“文化”的国度来说，地方社会的各种活动和组织方式，差不多都可以在儒学的文献中找到其文化上的“根源”，或者在朝廷的典章制度中发现其“合理性”的解释。区域社会的历史脉络，蕴涵于对国家制度和国家“话语”的深刻理解之中。如果忽视国家的存在而奢谈地域社会研究，难免有“隔靴搔痒”或“削足适履”的偏颇。既然要求研究者在心智上和感情上尽量置身于地域社会实际的历史场景中，具体地体验历史时期地域社会的生活，力图处在同一场景中理解过去，那么，历史文献的考辨、解读和对王朝典章制度的真切了解就是必不可少的。就是对所谓“民间文献”的解读，如果不是置于对王朝典章制度有深刻了解的知识背景之下，也是难免有“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缺失的。

也就是说，在具体的研究中，不可把“国家—地方”、“全国—区域”、“精英—民众”之类的分析工具，简单地外化为历史事实和社会关系本身，不可以“贴标签”的方式对人物、事件、现象和制度等做非彼即此的分类。传统中国区域社会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努力了解由于漫长的历史文化过程而形成的社会生活的地域性特点，以及不同地区的百姓关于“中国”的正统性观念，如何在漫长的历

白墩乡的故事：地域史脉络下的乡村社会建构——

史过程中，通过士大夫阶层的关键性中介，在“国家”与“地方”的长期互动中得以形成和发生变化的。在这个意义上，区域历史的内在脉络可视为国家意识形态在地域社会的各具特色的表达，同样地，国家的历史也可以在区域性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全息”地展现出来。只有认识了这一点，才可能在认识论意义上明了区域研究的价值所在。

在追寻区域社会历史的内在脉络时，要特别强调“地点感”和“时间序列”的重要性。在做区域社会历史的叙述时，只要对所引用资料所描述的地点保持敏锐的感觉，在明晰的“地点感”的基础上，严格按照事件发生的先后序列重建历史的过程，距离历史本身的脉络也就不远了。在谈到地域社会的空间结构与时间序列的关系时，应该注意到，研究者在某一“共时态”中见到的地域社会的相互关系及其特点，反映的不仅仅是特定地域支配关系的“空间结构”，更重要的是要将其视为一个复杂的、互动的、长期的历史过程的“结晶”和“缩影”。“地域空间”实际上“全息”地反映了多重叠合的动态的社会经济变化的“时间历程”。对“地域空间”历时性的过程和场景的重建与“再现”，常常更有助于对区域社会历史脉络的精妙之处的感悟与理解。

在以上的问题上，这套丛书的编者有相当接近的共识。这些共识的形成，是长达二十余年共同的研究实践和学术追求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海外的人类学家、历史学家与大陆学者共同推动一系列的中国乡村社会史研究计划，希望这些计划所取得的进展，有可能超越传统汉学研究的窠臼，让新一代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和研究结论具有更好地与国际学术主流对话的可能，并在更加深刻的层面上改变学术界和公众对于历史和史学的看法。

这套丛书的另一风格，就是强调文献解读与实地调查的结合。只有参加过田野工作的研究者才能真正理解，独自一人，或与一群来自世界各地、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同行，走向历史现场，踏勘史迹，采访耆老，搜集文献与传说，进行具有深度的密集讨论，连接过去与现在，对于引发兼具历史感与“现场感”的学术思考，具有什么样的

意义。置身于历史人物活动和历史事件发生的具体的自然和人文场景之中，切身感受地方的风俗民情，了解传统社会生活中种种复杂的关系，在这样的场景和记忆中阅读文献，自然而然地就加深和改变了对历史记载的理解。在调查中，研究者必须保持一种自觉，即他们在“口述资料”中发现的历史不会比官修的史书更接近“事实真相”，百姓的“历史记忆”表达的常常是他们对现实生活的历史背景的解釋，而不是历史事实本身，但在那样的场景之中，常常可以更深刻地理解过去如何被现在创造出来，理解同样也是作为“历史记忆”资料的史书，其真正的意义所在及其各种可能的“转换”。在实地调查中，研究者也可以更深切地理解过去的建构如何用于解释现在，结合实地调查，从不同地区移民、拓殖、身份与族群关系等方面重新审视具体地域中“地方性知识”与“区域文化”被创造与传播的机制，就会发现，许多所谓“地方性知识”都是在用对过去的建构来解释现在的地域政治与社会文化关系。总的说来，通过实地调查与文献解读的结合，更容易发现，在“国家”与“民间”的长期互动中形成的国家的或精英的“话语”背后，百姓日常活动所反映出来的空间观念和地域认同意识，是在实际历史过程中不断变化的。从不局限于行政区划的、网络状的“区域”视角出发，有可能重新解释中国的社会历史。

编这套丛书，是为了表达一种具有方向感的学术追求。编者强调自己的工作学有所本，同时也相信自己的追求属于一个有上千年历史的史学传统的自然延伸。这套丛书的作者们都热爱自己的研究，热爱自己所研究的人们，热爱这些人们祖祖辈辈生息的山河和土地。在大多数情况下，丛书的作者们所从事的是一项与个人的情感可以交融在一起的研究，学术传统与个人情感的交融，赋予这样的工作以独特的魅力。但大家对于做学问的目的，还是有着更深沉的思考。他们希望这样的研究，最终对整个中国历史的重新建构或重新理解会有一些帮助。同时，他们也期望这样的工作，可以参与到一个更大的学术共同体的共同关注的问题中去。他们强调学术研究要志存高远，要有理论方面的雄心，要注意从中国历史的实际和中国人的意识出发理解传统

中国社会历史现象，在理论分析中注意建立适合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实际情形的方法体系和学术范畴。他们希望在理论假定、研究方法、资料分析和过程重构等多个层次进行有深度的理论探索，特别从理论上探讨建立传统中国区域社会历史新的解释框架的可能性，并由此回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面对的各种重要问题，力图对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整体发展有所贡献。

是为序。

2006年7月12日

于广州康乐园马岗松涛之中

序 言

许怀林

读完了肖文评博士的《白垵乡的故事：地域史脉络下的乡村社会建构》，我的一个心愿得到满足，感到非常高兴，因为这是一份实事求是、细致解剖客家基地大埔县一个乡村的学术报告，它详尽地展示了明清时期粤东北地区落后乡村发展进步的精彩画面。作者带你走进一个又一个的家族世界，观赏他们起伏不定的人生经历，随着“梗民”、“乡豪”向“税户”、“士绅”的转变，乡村也从“化外”进入“化内”，成为儒学礼仪之乡。本书顺着生活的逻辑顺序而来，得到合情合理的历史结果，让人欣喜地为之点头折服。

从1990年以来，我看过不少关于客家的著作，例皆大而全式的宏观纵论，地域涉及多个省州府县，时间贯穿上下古今，就是不深入一个乡镇中去进行实地考察，了解当地人的生活经历，探寻乡村社会的结构与变迁。那些看似涵盖全局、普遍适用的综合结论，总让人觉得浮在半空，难免不生疑窦：我县本乡真的是这样吗？作者们的说法在教导民众如此这般看待历史，可是先辈们的蹒跚足迹，却很难和那些说法合辙。

为什么这本书就能避免空论泛观之弊呢？因为作者出门时没有带着先验的框架，进入研究领域时是抱着尊重事实，从实际出发的态度。其研究途径是：首先，以白垵乡村为考察对象，在传统史学的时

白垩乡的故事：地域史脉络下的乡村社会建构

间维度基础上加入具体的空间维度，历史过程在时空连接之后就更具有认知的可操作性。其次，把村落社区当作社会的“缩影”，从社区中去理解大的社会和制度的变化，在宏观的背景中去解读社区生活。零散而片断的资料放到社会体系中去理解时就恢复了活力，显示出制度之间的关联性。第三，细心做田野调查，坚持实地体验，“走向历史现场”。在与村民的深度访谈中，获得古人古事的民间遗存——故事与传说，从而把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文献背后的“故事”因之明朗，从而真正读懂文献，认清乡村社会全貌。

在具体方法上，肖文评博士借鉴当前“华南研究”中对传统乡村社会研究的经验，整合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广泛收集、整理民间文献的同时，虚心进行访谈；把文献、口碑和实地考察相结合，对社区进行深入的总体评估；重点放在家族、教育、国家权力在乡村中的表达，民间信仰，市场网络，社会结构等方面；在过程“再现”中作结构分析，使一个村落处于区域整体的关怀之中；对文本的解读，坚持从当地的历史实际和当地人的意识出发。看清了当地的社会历史现象，才能发现和阐释其历史意义。

鉴于白垩是个多元的有长期历史的乡村，肖博士参考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关于“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及与之相应的“结构”、“局势”和“事件”的研究要领，既从当地人的处境出发，进行“同情之理解”，又有自己的研究视角与评议。他深入发掘地方文献，看重当地人士在当下时间的作品的直观性、真实性，尤其是那些当事人的记录，对解读乡村社会具有不可替代的原始价值。与此同时，他又注意到访谈对象由于文化程度、地域观念以及个人经历的差异，提供的信息比较芜杂，带有片面性，需要认真的考辨与梳理，鉴别其真伪，分辨其价值，避免以点代面，以偏概全。资料鉴别工作之重要，不逊于对资料的占有。凭借不可信的资料作出的判断，就像凭假证定罪，结果必然是颠倒是非。所以，资料的鉴别是否得当，是对研究者的学风、专业基础与研究能力的检验。

在这本书中，以白垩乡为中心，展示了清远河流域的崛起和繁荣。白垩乡四百年间的变迁故事，见证了一个“化外之地”逐渐变

为中央王朝“典范之区”的过程，是明清以来韩江干流地区，以及粤闽赣交界地域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缩影。为追寻历史，作者依时间顺序，以人物为中心，通过四个章节的叙述，探讨具有畬瑶背景的白垠地方社会，如何实现社会转型；白垠士绅如何应对社会变乱，实现自保，进而建构乡村社会；在康熙年间白垠士绅如何运用社会资源整合宗族社会，实行儒家化的改造，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整体性变迁；以及乾隆年间白垠成为区域性的行政、经济、文化中心的过程。最后，作者认为：“白垠近四百年的社会变迁的历史，是科举制度下培养的士绅，应对各个时期出现的社会问题而不断建构乡村制度的过程，是地域社会发展过程的反映，也是国家意识在地方社会实现的过程。”

大埔县是粤东北的客家地区，阐释白垠的社会演变必然要论及客家。书中对族群的融合是结合地域历史背景，具体论述融合过程，不是停留在大而化之的层面。从白垠的历史中发现，粤东地域社会的底层文化，有着深厚的畬瑶文化传统，这个地方由官府管教不到的畬瑶之地，经过一系列变乱和官府加强控制之下，在地方士绅崛起后，逐渐接受教化，实现了社会转型，成为中央王朝的一个组成部分。白垠的历史实际说明，客家人“崇文重教、耕读传家的传统，科举的兴盛，并不是中原衣冠士族的遗留，而是在经历族群融合、官府平定‘贼寇’的洗礼，经过数代人的积累，‘叨受先人之积累，与父兄之教泽’，才得以实现。是各宗族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结果，同时也是国家推行教化政策和地方宗族重视的结果”。（见本书第471页）

客家地区的古朴民风，不是中原移民的遗留，“通过白垠这个地域性的文化中心形成过程的考察，发现所谓客家优良传统，实为士绅们通过掌握的‘话语权’，以儒家伦理为指导，变革和重新解释传统习俗的结果”。（见本书第471页）

对于客家地区的土堡围寨建筑的兴起，作者指出：明中叶以来，赣闽粤交界地区一直动荡不安，白垠人为了在动乱环境中生存，依据传统生存策略，修筑山寨土堡，“贼寇”来则人为防守，“贼寇”去

白垵乡的故事：地域史脉络下的乡村社会建构——

则出为耕种。地方士绅们凭借在地方上的声望，以及对保卫家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充当了修筑围寨的倡导者和修建者。

诚如作者所言，通过对白垵乡村这个典型的剖析，帮助我们进一步把握了明清时期四百年间粤东北山区的社会发展过程，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了“客家”传统社会。正是在这一时段中，“客家”由“化外之地”进入“化内之区”，足见客家起源的“本地性”是真实的，所谓“南迁”而来是不真实的。

很显然，作者依靠社会发展本来的秩序，考察社会变迁的客观过程，解释各种民间生活样式，故而关于客家、围屋、二次葬等都得到合情合理的评判。反之，那种从预先形成的客家概念出发，然后把古人古事放进框子里套的所谓研究，必然要与历史的实际情形相悖。

为什么白垵村能成为粤东北山区的缩影？为什么考察的是约四百年的社会变迁？为什么对“客家”需作如是观？感兴趣的读者阅读本书之后，自然会有答案。

总而言之，该书通过剖析白垵村民众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大致还原了这个乡村的文明进化史，而且展现出粤东北山区乡村社会的发展与演变过程，阐明了国家、地方精英在乡村社会中的互动关系，是一部解读村落社会史的原创著作。关于白垵乡宗族社会的建构，由“贼穴”向礼义之乡的转变，士绅在控制乡村社会中的主角地位，以及乡村社会生活的儒家化过程，本书都资料翔实，论述精辟，颇具学术意义。

肖文评博士能够获得这份厚重成果，还在于他一贯踏实求学，不务空言。20世纪90年代他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候，把江西省乐安县流坑村作为研究对象，一再进村采访调查，尽量掌握原始资料，体验流坑人的生活环境，有了直观感受和当地文献之后，遂能把流坑乡村、董氏家族和明清社会联系起来考察，大体上复原流坑社区的演变过程，揭示其内在原因和客观影响，写成学位论文《宗族支柱由科举到商业贸易的转移——乐安县流坑董氏宗族个案分析》，在答辩中获得好评。这次的学习实践，是他后来研究工作的基础。现在的这本论著，是他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两者之间显然有着内在联